

【文学研究】

文艺学的学科身份重建

魏红珊¹, 卢衍鹏²

(1.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71; 2. 枣庄学院 中文系, 山东 枣庄 277160)

摘要: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文艺学身份重建,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主义坚持文艺学中的元理论、科学性、经典化;反本质主义重新定义文学性、文学自主性,并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下反思文艺学的学科性。在重建文艺学的思路,一派主张在文艺学内部进行调整,拉近与现实的关系;另一派主张从文艺学外部重建历史化、地方化的文艺学。前者的优势在于拥有体制性的确认和多年的学科底蕴,劣势在于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对日新月异的文学、文化现象反应迟钝,与社会现实、大众实际的文化活动、文艺实践等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后者的优势在于紧跟社会、时代的文学、文化节奏,对崭新的文学、文化文本具有超强的敏感,善于对其进行文本分析,劣势是过于偏爱的西方理论,自我理论创新不足,解构有余而不足以建构的文艺学新的文化身份。

关键词:文学;文艺学;学科反思;文化身份;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7)03-0078-05

Reconstruction for cultural identity of literature and art

WEI Hong-shan¹, LU Yan-peng²

(1.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engdu 610071, Sichuan,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aozhuang University, Zaozhuang 277160,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being reconstructed under linguistic environ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Reconsideration of discipline on literature and art has already become a prolonged academic hot spot. There are two thinking modes: essential principle and the counter-essential one. The essential principle insists on a intrinsic theory, the scientific nature and the classics, while the counter-essential principle redefines the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independency. Moreover, the literature and art discipline is reconsidered under esthetic linguistic environment in the daily life.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some advocate adjustment of the interior of literature and art to make it closer with the reality relations, and some insist on reconstructing history and local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from exterior. The advantage of the former is that it has the confirmation of system and years' discipline. The inferior position is slow in reacting, and is disjointed with society reality. Literature and art practice obviously run adrift of actual culture of masses. The latter advantage lies in keeping abreast of society and the times. The version has ultra-strong sensitiveness to western new culture, and is expert in the analysis in carrying out the version. The inferior position is that it lies on western theory, but its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s excessively insufficient. So it is not able to reinstate new structure of literature and its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literature; literature and art; reconsidering of discipline; cultural identity; essential principle; counter-essential principle

收稿日期: 2006-12-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西部项目(06XZW006)

作者简介: 魏红珊(1966-),女,四川成都人,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0 引言

文化身份作为全球化社会的一个概念,在语义上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最早被认为是文化政治的基础。按照乔纳森·弗雷德曼的说法,“这表现为‘新’身份、新社会类别以及通常情况下新政治群体的增生”^[1]。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文化身份研究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风起云涌的反殖民斗争以及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殖民主义的反思紧密相关,并以反霸权意识形态为基石。若热·拉腊因在《意识形态与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立场》中从现代性角度论述了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潮流变中的身份问题。安东妮·吉登斯认为,“身份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项身份工程”^[2]。文化身份定位问题已成为文化研究的焦点,西方学术界对文化身份的研究专注于后殖民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化思潮日益冲击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文化身份不仅逐渐成为以经济、政治、文化为基础的,人与社会相联系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关键性话语,而且冲击着中国文艺学等学科的身份定位问题,成为未来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为例,从文化身份的确立方式、确立原因以及确立的文化价值出发,揭示文艺学学科重建所涉及的身份观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焦虑,并从符号学理论出发,透视文化身份对文学研究者的主导作用和文化建设意义。文化研究作为文艺学的方法和理论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得到广泛重视,并引起人们的持续关注。这一研究完全摆脱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阈,渗透到传统的以及新出现的“非”传统文化形式之中。面对文化研究带来的影响,无论是支持者、乐观者,还是否定者、悲观者,都无法回避文化研究及其所带来的文化语境。近百年的中国现代文艺学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不仅要面对更多的“新”的文学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所提出的新要求,更要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的文化身份,以适应飞速发展的文学与时代。

1 文艺学的本质主义文化身份

这里的本质主义指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它认为主体只要掌握了普遍的认识方法,就可以获得对历史本质绝对正确的、本质的认识^[3]。对文艺学的文化身份来说,本质主义者认为文艺学、文学中存在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永恒的本质(如文

学性、人文关怀等),他们内在设置了一种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热衷于元叙事、宏大叙事等理论与话语的建构。

1.1 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反思”——元理论的坚守

中国的文艺理论一直是一种元理论,是一种规范、严格的理论体系,它的起点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在对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反复阐释的基础上,加上对苏俄文学理论和德国古典美学的阐释和吸收,中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在很长的时期里,文艺理论的探讨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经典作家的原著作为评判标准。这种坚持和守护元理论的做法一直没有间断过,在世纪之交的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反思之中表现尤其明显。

其一,以“国家—民族”的超级寓言捍卫文艺学的元理论地位。“国家—民族”在整个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发展中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地位和巨大影响,甚至文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是“国家—民族”的表现之一。文艺学的发展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发展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不足以证明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其实,把文艺学置于革命事业的强有力的支持之下,赋予文艺学以“国家—民族”的巨大寓言,反而降低了文艺学的学科身份。

其二,用二元对立的批评方式限定文艺学的研究视野。文学之于人类社会的价值应该是多方面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而现行文艺学体制中有专门的文学类型及其特征的归纳和限定,这表现在划分文学种类及其特征时存在严重的机械化、教条化等现象,把文学类型用僵化、固定、超历史的“本质—特征”、“文本—现象”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体现出来。例如十四院校的《文学理论基础》把诗歌的特征归纳为“最集中地反映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语言精练准确”等^[4]。而现实生活中的诗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于坚等诗人早就不再坚持这样的写作,甚至反对这样的诗歌。

其三,用全球化语境凸显文艺学的“专业”地位。全球化作为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概念,在文艺学的发展变化中之所以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与全球化相对的是本土化,特别是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及其在中国学科体制中的位置。在全球化语境之下讨论文艺学的发展,无疑张扬了论者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责任感,这也成为文艺学保卫学科身份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发展状况”学术研讨会上,论者首先谈论的是文学能否存在和发展下去,并且把电视剧、电影等图像艺

术称为一种“外视图像”的艺术,文学则是一种“内心视像”的艺术,而“文学由语言所构成的丰富体验,不是其他媒介轻易可以翻译和取代的”。显然,论者认为文学作品比电视剧、电影等图像艺术要高一等,文艺学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文学这种艺术样式,而电视剧、电影不能进入文艺学的研究视野。正如论者所说,文学比其他艺术更“内心”、更“体验”,问题是现在有多少人在看电视、看电影,而又有关注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学就不能只“和其他艺术(比如图像艺术)相互融通,各学科之间也要做到相互交流”,而要彻底改变对其他艺术样式的歧视态度,就必须和图像艺术等进行平等对话和认真研究,这样才可能真正扩展文艺学的研究视野^[5]。

1.2 文艺学的经典化身份

经典是一种文化的特殊类型,是由无数这类文化的经典文本构成的。文艺学之所以走向经典化,是因为经典的特殊意义。经典在本义上有3种含义:一是指在某种文化中具有根本性或权威性的著作;二是指文学艺术方面具有权威性的典范作品;三是指上述2种内涵所确认的经典的的标准或原则^[6]。因此,经典不仅代表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规范,而且是模铸人的思想、制约人的行为的文化力量。论者正是看重经典的这一特性和力量,希望以此巩固文艺学的学科地位。

其一,普遍性、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普遍主义的“经典”是承载人类普遍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典籍,因而具有“超时空”和“永恒性”特征,这是指经典作品要有长久甚至永恒的生命力,就要经得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和阐释。童庆炳认为,经典的普遍性在于“写出了人类共同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于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7]^[179]。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是一种将经典的构成条件限定在文学作品内部的观点,认为文学作品本身的特征是决定其是否构成经典的根本因素。把文艺学建立在这样的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之上,限定了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研究方法。

其二,特殊性、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特殊主义的“经典”是由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以及性别取向等因素构成的,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人或机构出于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建构的,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在经典的界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佛马克认为,研究经典问题,一方面要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对

以前的经典如何形成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要从批评的角度研究新的经典如何形成,或现存的经典如何被修订。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从外部对经典的研究,认为外部因素是经典形成和被改变的决定性因素。

其三,折中立场的经典化理论。上述2种截然相反的经典化理论似乎是要将我们引入一个各有其片面性的真理,而更多论者似乎采取了一种折中立场。孟繁华认为,经典的确立与颠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经典的确立与颠覆的历史,经典的每一次危机也是经典重新确立的过程;金元浦认为,作为历史流变物的经典一般有一个经典化—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过程;经典代表了一种在一定时空内具有普遍性和规范性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正是依赖于解释而得以形成和实现的^[7]^[192]。

其四,重构文艺学的经典化体系。盖生在论证文学的文化研究必将退潮的基础上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作重构文艺学的经典化体系的整合主导元,因为其具有较强的历史前瞻性、更广阔的理论视野、既辩证又整体化的思维方式和作为开放性思想体系的价值指向性,必然成为经典化文艺学重建的学理基础并为之提供科学的方法论^[8]。

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是本质主义文艺学所依据的基石之一,而经典化理论自身的不同纬度注定了文艺学本质主义地位的不确定性。

2 文学性的历史主义文化身份诉求

与本质主义相反,文学性的历史主义文化身份诉求是指对文学及其本质采取一种历史的、非本质主义的开放态度,它特别强调关于文学本质的各种界定的具体文化语境,而不是希望寻找一种普遍有效的文学定义。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文学研究、文艺学学科更加关注文学存在的语境与文学的双向互动,文艺学不再是本质主义的学科框架,而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话语建构。

2.1 反本质主义的文学及其文学性

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研究首先反思文学及文学性的普遍有效性和封闭性。论者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认为文学的形成不是单一条件决定的,而是由各种不同的条件共同决定的;文学性也不是抽象的、永恒的、客观的文学性,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的文学性^[9]。

其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偶然性、相对性。论者引

用英国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特里·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指出文学产生的几种情况:一是开始作为历史或哲学著作,后来才被当作文学,例如中国先秦时期一些哲学、历史著作今天被选入中国文学经典;二是开始是文学,后来因为考古学的意义而被重视。论者据此推论出,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原因中,后天的因素比先天的更加重要,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先天的普遍本质^[10]。德里达在《这种叫做文学的奇特体制》(1989)中指出,文学是一种思想建构,是知识领域中“规则”的产物,只不过这种思想性和社会规则都镶嵌于文本的内部而难以为人发现,“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的本质,而是文本的内在属性”^[11]。

其二,文学有其内在的社会思想结构。中国文学观念有一个发展演变和体制化的过程,文学一直是某种思想价值的构造物,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意识形态背景。陶东风把这种文学观念的演变看成是文学“祛魅”的过程,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动的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之“魅”、“三突出”的创作方法之“魅”和“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之“魅”;第二次是祛文学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赋予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神秘性和私有性之“魅”^[12]。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拥有高高在上的地位和崇高的价值,是现代社会思想赋予的,并且与其他文献材料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客体”。

其三,文学是具有实践功能的意识形态。文学是一种话语,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里被陈述”的语言^[13]。现实中的文学并不是抽象的语法规则,文学研究要关注各民族在各个时期对文学的看法和具体运用。这样就不能仅仅把文学当作一个永恒不变的中性客体,而应该是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活活动”或“社会实践活动”。文学性还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主要表现在审美效果遮蔽现实矛盾、本质追问预设普遍法则和文学惯例彰显统治地位等方面^[14]。

2.2 历史主义视野中的文学自主性

文学的自主性、自律性是中国现阶段文学理论中主要的文学观念之一,也是文艺学作为学科的一大基础。这种观念在与文学的工具论、他律论等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学观念的统治地位,并成为几乎所有新一代《文学理论》教材中的“法定”概念。反本质主义论者从历史主义的视角反思文学自主性的合法性,挑战文学理论的权威观念,企图打破现存

文学理论的观念基础,祛除文学研究之“魅”,使文学研究进入历史的、社会学的思路之中。

其一,文学自主性诉求是与政治文化的合谋。杜书瀛在反思新时期文艺学时指出文艺学的“拨乱反正”在学理上有其肤浅性和保守性,文学自主性的获得有其局限性。“当时的文艺学在‘拨乱反正’名义下所进行的这些活动大都没有进行学理层面的深入探讨,因而也就没有取得多少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深刻的理论成果”,文学性的“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进行了简单化处理,比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拨乱反正’的口号本身纯粹从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带有‘向后看’的性质”,“乱”是文革之“乱”,“正”是文革之前的“正”^[15]。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的自主性诉求具有远远超出文艺本身的社会文化含义与政治含义。可以说,正是自主性赋予了知识分子的政治介入以特殊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一方面,它借助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而进入主流话语;另一方面,它恰恰又通过淡化文艺的功利性、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突出其自主性、自律性的方式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16]。无论是文艺学“拨乱反正”中的肤浅性,还是文学自主性中的“意识形态性”,都揭示了文学与政治文化之间的暧昧和合谋关系。

其二,文学自主性应该重视与市场的关系。自从市场经济成为文学不可回避的生存环境以来,文学与市场的关系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但是,论者在判断市场与文学的关系时,总是处于消极—积极等二元对立的简单判断之中,这实际上并未真正重视市场对文学自主性的重要意义。市场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让文学有了更多的选择,这实际是文学自主性的增长,而不是倒退。与其对市场作苍白的价值判断,还不如认真研究文学在市场中的变化和发展;否则,文学理论研究对市场不敢“越雷池一步”,永远不会理解文学在市场化中的变迁,文艺学也无从发展。

其三,对文学自主性要做历史、社会学分析。反本质主义论者借助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以及西方现代社会学理论,从社会学角度对文学自主性作历史主义的评价。从社会学角度看,“文学的自主性实际上就是自主的文艺场域及其自身游戏规则的确立”^[16]。 “文艺场域”在这里是指文学艺术所存在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性现象,是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法律场域等的分化和延伸,如现代学术制度就和文艺场域有关。虽然这种社会学分析还只是西方社会学的简单移

植,但是毕竟为揭示文学自主性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突出了文学自主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3 文艺学的身份重建及其反思

文艺学中存在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研究思路决定了文艺学的重建也有2种思路。

3.1 本质主义的反思与重建思路

本质主义者首先认识到文学理论的3个危机:一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脱节;二是大力引进外国学者的思想作为理论来源,外国的学术思想成了我们的风向标;三是顺应现状、迎合平庸、忽视精神超越,因而弱化了人文学者应有的批判精神。

对于文化研究,论者认为存在很多具有一定审美色彩的文化现象,不是文学而是泛文化现象和物质建构都需要文化研究去阐释^[17]。对个人来说,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相比,并不存在界限的区别,可以一身二任或多任;对学科建设来说,即使文学理论扩容也仍有其自身的限定,而文化研究如何成为学科还众说纷纭。

有些论者主要通过否认文化研究的学科化来否认文艺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转向”,最终肯定文艺学的学科地位。首先,文化研究在学理上缺乏学科依据。文化研究直接源于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而西方的文化研究已经日薄西山,本身就很简单,已经远离文学研究。其次,引进的文化研究理论并没有针对文艺学的现实问题。其问题在于与当前文学相脱节,学院气太重,对文学理论的自洽性、体系的完整性考虑得多,而对文学现实的关注不够。

在此基础上的文艺学重建不外乎以下思路:一是关注现实,使文艺学具有源源不断的现实基础;二是理论建构上不断破旧立新,取得与文学现实和实践的相对平衡,产生新的活力。

从上述的反思与重建思路来看,论者并没有否认文艺学存在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在肯定文艺学学科性质的基础上进行的。换句话说,文艺学问题的存在是因为文艺学自身没有关注现实,也没有理论创新;文艺学问题的解决也要靠文艺学自身的变革。

3.2 历史化、地方化的文艺学重建思路

历史化、地方化的重建思路是在反本质主义思维指导下产生的,是借鉴西方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成果的产物。

论者否定了现存的文艺学学科知识结构和体系,认为这是一种丧失历史性与民族性的知识体系。

其一,文艺学知识具有拼凑性、综合性。几乎所有的文艺学教材都在寻找和建构“普遍真理”和“共同规律”,造成了知识的一元化封闭格局。其二,文艺学知识丧失了历史性和地方性。现有文艺学教材把文艺学机械地分割为“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和“欣赏(批评)论”,并且把古今中外的所有相关言论加以肢解和拼接,完全不顾知识的文本语境、历史语境和地方语境,使得文艺学成为马列主义文论、中国现代革命文论、中国古典文论等的“大拼盘”。其三,现有文艺学知识缺少历史具体性与差异性。拼凑起来的文艺学体系只有抽象的框架,而没有具体可感的场景,无法从中了解文学观念的历史沿革与变迁。其四,现有文艺学的教学加深了学科僵化。文艺学的教学中“断章取义”现象更加严重,学生无法了解文学的整体面貌和历史演变。文艺学的考试也只关注文艺学的系统性知识,而不是鲜活的文学。

根据文艺学现状,论者提出了文艺学的历史化、地方化的重建思路。其一,以当代西方的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武器重建文艺学知识的社会历史语境,有条件地吸收包括“后”学在内的西方反本质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发挥其建设性的结构功能——以重建为目的的解构。其二,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理解文艺学中的“本职”和“真理”,将其事件化、历史化、地方化,吸收福柯的“事件化”方法与布迪厄的“反思性”方法。

从文艺学反思和重建的思路来看,这种历史化、地方化的重建思路在破除文艺学僵化的知识体系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重建文艺学的过程中,这种思路显得“破有余而立不足”。但是,这毕竟是从文艺学的外部对文艺学的理性思考,为其突破本质主义的思想框架提供了思路。

4 结 语

本质主义文艺学重建的优势在于拥有体制性的确认和多年的学科底蕴,其劣势在于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对日新月异的文学、文化现象反应迟钝,与社会现实、大众实际的文化活动、文艺实践等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反本质主义文艺学重建的优势在于紧跟社会、时代的文学、文化节奏,对崭新的文学、文化文本具有超强的敏感,善于对其进行文本分析,其劣势是过于偏爱西方理论,自我理论创新不足,解构有余而不足以建构文艺学新的文化身份。因此,梳理和反思2种重建文艺学文化身份的思路和得失,

(下转第94页)

流文化侵蚀的同时,勇敢地指出黑人社区中“恶”的一面——把佩科拉当作替罪羊来洗刷自己的不幸,这中间也包括她自己。

由此看来,克劳蒂亚拆散洋娃娃的行为意义深刻,不但对白人女性主义排除黑人女性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而且有力地弥补了白人女性主义理论的缺陷,从更深层次上拓展了女性主义的理论范畴。

3 结 语

鉴于美国黑人文学在经历了从描述到抗议、从激进到内省、从倡导黑人民族性到关注人类共同命运这一逐步成熟的阶段,因此发表于1970年的《最蓝的眼睛》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上接第82页)

对于把握文艺学的身份嬗变,在新的语境下重建文艺学的学科身份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无论是本质主义的重建思路,还是反本质主义的重建思路,都不难发现其中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显示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学术鸿沟和理论偏执。这两者的优势和劣势是显而易见的,却也是难以克服的。因此,要真正重建文艺学的学科身份,必须摒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包容西方文化理论中适合中国学科现状的合理因素,尤其是当代西方地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才能走出本质论争的狭隘视野,解决文艺学研究和实践中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Jonathan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 [2] 陶家俊.文化身份的嬗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3] 罗蒂.后哲学文化[M].黄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 [4] 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 [5] 程革.走向对话和开放的文学研究[J].文学评论,2006,51(3):203-205.

- [2] Toni Morrison. The bluest eye[M].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70.
- [3] Rollo M.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dilemma[M]. New York: Norton Press 1967.
- [4] 杨韶刚.寻找存在的真谛——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5] Nancy J P, Toni Morrison.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1987.
- [6] Wilfred D S. Toni Morrison[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9.
- [7] Gerda L. Black women in white America[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1981.
- [8] Rollo M. Love and will[M]. New York: Norton Press 1969.
- [9] 李银河.福柯与性[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 [10] 王守仁.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美国二十世纪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1] Gurleen G. Circles of sorrow, lines of structure[M]. Shreveport: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6] 张杰.高新技术时代经典艺术的命运[J].社会科学辑刊,2003,29(3):154-161.
- [7] 和磊.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J].文艺研究,2005,22(9):155-157.
- [8] 盖生.文学的文化研究退潮与经典化文艺学重建的可能[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22(4):130-137.
- [9] 周小仪.西方文化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 [10] 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1] Jacques Derrida. This strange institution called literature: An interview with Jacques Derrida[M].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2.
- [12] 陶东风.文学的祛魅[J].文艺争鸣:理论评论版,2006,22(1):6-22.
- [13] 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蒋子华,张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 [14] 董馨.论“文学性”的意识形态功能[J].东岳论坛,2005,26(3):120-122.
- [15] 杜书瀛.新时期文艺学反思录[J].文学评论,1998,51(5):77-88.
- [16] 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17] 钱中文.正视中国文学理论的危机[J].社会科学,2006,39(1):95-98.